

研究报告

2019 年第 93 期

2019.09.29

执笔：殷红，王祺，胡婕，吴蔚，
张静文，李良志，陈婧杰

jingwen.zhang@icbc.com.cn

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主题教育活动专题调研报告

摘要：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我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举措。

对标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在经济基础、科技实力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基础较好，但面临“一个国家、两种体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带来的挑战。建议政府开展大湾区金融监管机制创新、发展风险投资、大力推动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建设，以金融创新促进湾区全面融合。

金融机构在服务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将迎来大量机遇，包括基础设施、科创升级和宜居城市建设方面的投资机遇，跨境金融服务机遇，总部经济机遇和政策机遇等。建议我行加强对粤港澳大湾区业务发展的顶层设计，加强与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的沟通协作，同时，各业务条线还应加快推出大湾区专项政策。

关键字：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创新，金融科技

重要声明：本报告中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官方统计机构和市场研究机构已公开的资料，但不保证所载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报告不代表研究人员所在机构的观点和意见，不构成对阅读者的任何投资建议。本报告（含标识和宣传语）的版权为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有，仅供内部参阅，未经作者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上网、引用或向其他人分发。

一、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重大战略，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

（一）深刻理解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重大意义

1.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将有力促进港澳与内地更加紧密地融合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珠三角九市，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粤港澳合作不断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实力、区域竞争力显著增强，已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有力体现**，既是香港、澳门探索发展新路径的客观要求，也是广东继续当好新时代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大机遇、大文章。

2.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

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有利于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



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增进香港、澳门同胞福祉，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让港澳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3.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规划。

按照国家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要建成活力充沛、创新能力突出、产业结构优化、要素流动顺畅、生态环境优美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这与新发展理念高度契合，有利于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为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提供支撑。

4.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撑。

粤港澳大湾区地处我国沿海开放前沿，以泛珠三角区域为广阔发展腹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竞争力、更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拓展了新空间。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实现区域双向开放，也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撑。

（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政策体系正在形成

1. 粤港澳大湾区的顶层设计已基本完成

从2003年开始，我国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加强粤港澳地区经贸互动，释放珠三角地区发展潜能，形成了以CEPA（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11个补充协议为核心的政策体系（见附表1），为粤港澳地区互动联通奠定了基础。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这是纲领性文件，在明确总体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五大战略定位和八大发展重点，并在城市空间布局、科创中心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金融市场发展、人才培育、宜居城市、文化交流等核心领域进行了详细规划。

表1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的目标、定位和发展重点



2. 各部委支持大湾区建设政策即将出台

目前, 发改委、财务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已发布支持大湾区建设的政策, 如发改委 2017 年发布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 财务部 2019 年 3 月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等。我们在调研中还了解到, 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针对大湾区建设的更多专项政策也正在积极筹备中, 部分将在年内出台。

3. 湾区各市积极出台政策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纲要”推出后, 广州、深圳两市率先行动, 2019 年 7 月, 广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 提出“三步走”安排, 携手港澳

有力有序推进大湾区建设。同月，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印发《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进一步明确广东省今后三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点任务和责任分工。深圳市制定了“纲要”实施意见、三年行动方案和近期工作要点，形成了路线图、任务书和施工图。广州和深圳两市的湾区专项政策体系基本形成（见附表2）。港澳地区也在发展规划中专门提到了支持大湾区建设。

二、粤港澳大湾区与全球三大湾区的比较

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是全球三大湾区，通过研究其发展模式、特点和规律，能够为我国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提供重要参考，并为我行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和践行国家战略提供镜鉴。

（一）全球三大湾区发展模式及规律

1. 纽约湾区：位于美国东海岸，是全球著名的“金融湾区”，其形成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492年-1820年，纽约作为欧洲人进入北美的唯一港口，承接了大量殖民者带来的资本，农业和工业的发展推动了贸易的形成，纽约经济快速发展；



第二阶段从1820年-1870年，伊犁运河的建成降低了交通成本，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带来大量移民，纽约成为美国的经济贸易中心；

第三阶段从1870年-1980年，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获得发展良机，美元成为全球货币，纽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纽约湾区也确立了世界级湾区的地位。

2. 旧金山湾区：位于美国西海岸，是全球著名的“科技湾区”，其形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48年-1870年，淘金热潮带来人口激增，旧金山开始成为移民和商贸中心，工业化开始起步；

第二阶段从1870年到二战时期，旧金山湾区工业化迅速发展，同时以7座跨海大桥和奥克兰铁路为代表的交通网络逐渐建成，产业发展迅猛；

第三阶段为二战之后，斯坦福大学创立的科技园促成了硅谷的萌芽，产学研的良性互动推动了湾区科技创新，旧金山湾区成为全球“科技湾区”的代表。

3. 东京湾区：位于日本东岸，制造业是其支柱产业，目前共有38家全球500强企业总部，为三大湾区之首。与纽约和旧金山湾区相比，东京湾区的形成呈现明显的政策推动特征。1951年，日本政府颁布《港湾法》，规定由政府对整个

个国家港口发展的数量、规模和政策进行统一规划部署；1960年，日本推出《东京规划1960—东京结构改革的方案》，逐步构建湾区法律保障体系。20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实施“工业分散”战略，形成东京湾区分工明确、协同发展的产业布局体系。2006、2011、2014年，日本相继推出《10年后的东京—东京将改变》、《2020年的东京—跨越大震灾，引导日本的再生》以及《创造未来—东京都长期愿景》等专项湾区规划，通过延续性、可调整的统一规划实现经济的深度融合。

从三大湾区发展历史看，湾区的形成条件和发展经历阶段有相似之处：

湾区的形成条件主要包括四点：一是要素集聚，湾区与全球、所在国其他地区以及湾区内部的人力、资本、信息、商品等要素要能够自由流动；二是创新引领，湾区内要拥有一定数量的大学、研究院、创新型企业，科研成果要能够方便的转化；三是金融推动，湾区内要有成熟的金融市场和发达的金融中心，能够通过资金、经验、信息、创新支持湾区建设；四是湾区的形成往往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如淘金热、工业革命等。

湾区的发展都经历了萌芽、快速发展到创新引领三个阶



段，三个阶段经济的发展模式、要素特征和流动方式都具有不同特征：

从人口来看，湾区在萌芽期伴随着大量人口流入，人口数量红利推动湾区迅速发展；在迅速发展期，湾区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工人队伍壮大相伴相生；最终，人力资源向高端人才的优化升级再次成为湾区跨越式发展的主要动力。

从发展模式来看，湾区的萌芽大多由天然港口和外来资源输入带动，往往与特定历史时期和事件相关；快速发展阶段体现出政府部门有规划、有步骤的发展，三个湾区在这一阶段都进行了交通互联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创新引领阶段则体现出高知识、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的特征。

从产业结构来看，湾区在萌芽期均以出口贸易为主；快速发展阶段多呈现经济结构由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化的特征；创新引领阶段则均以新兴产业为主。

从城市空间布局来看，湾区的萌芽期均以一个大城市崛起为起点，形成“城市孤岛”；快速发展期内核心城市开始带动其周边城市发展，形成城市联动格局；创新引领期内湾区城市开始深度融合，相互协调，深入联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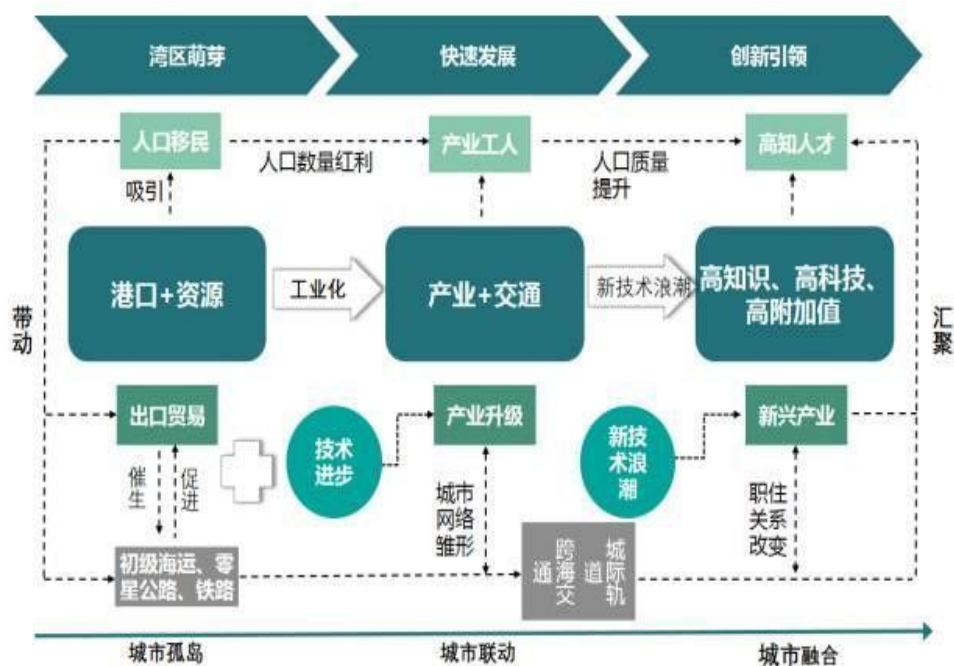


图1 世界主要湾区的发展规律

（二）金融支持三大湾区发展的模式

在全球三大湾区的形成过程中，金融是重要的驱动力，由于三大湾区的金融市场结构和产业特征各不相同，金融对其发展的支持模式也有所差异。

1. 国际金融中心引领模式（纽约模式）

纽约是全球第一的国际金融中心，其金融市场规模庞大、种类齐全，信贷、证券、保险、外汇、衍生品市场发达，为纽约湾区的发展提供了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支持。在银行业方面，美国前四大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富国银行和花旗银行）总部都位于纽约，四家银行资产达到全美银行业80%以上；在基金业方面，湾区共有420家对冲基金公司。



司，资金管理规模超过3万亿美元，全球著名的桥水基金公司总部也位于纽约湾区；在证券市场方面，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均位于纽约湾区，为企业直接融资提供强力支持。

2. 风险投资与科创公司互动的“旋转门文化”（旧金山模式）

旧金山湾区聚集了大量科创企业，硅谷孵化了诸如苹果、谷歌等著名的IT公司。由于这些科创企业初创期的风险较高，传统的银行贷款和资本市场无法对其进行有效支持，因此旧金山湾区的金融市场以风险投资为主。近年来，旧金山湾区每年风险投资总额超过200亿美元，占美国风险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由于风投机构和科创公司长期以来的良性互动，旧金山湾区形成著名的“旋转门文化”，即风投资金在科创企业创业初期提供资金支持，科创企业成功后就会转化为风险投资人支持其他企业创业。

3. 政府主导设计+主银行支持模式（东京模式）

与美国两大湾区凸显金融服务和科创的定位不同，东京湾区的金融市场侧重于为本国产业提供融资便利。二战后，日本通过制定产业政策、金融政策、根据经济发展阶段不断调整产业融资导向等措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布局，先后经历了政策金融、间接金融、直接金融、金融市场化改革等多

个政策期，形成以“主银行制度”为核心的融资体系，呈现出明显的“顶层设计”色彩。在东京湾区中共有银行总部 90 家，4 家都市商业银行中的 3 家都位于东京，包括三菱日联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瑞穗实业集团，三家财团的资产规模占整个东京湾区银行资产的 70% 以上。在直接融资方面，东京证券交易所是全球四大证券交易所之一，但其国际化程度不高，外国投资者比重不足 30%，外国上市公司仅有 6 家，这种分离式的离岸金融制度安排使得东京湾区与全球金融市场相对隔离，受到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小。

（三）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劣势分析

1. 粤港澳大湾区具备打造世界一流湾区的良好基础

首先，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基础较好，部分指标甚至好于全球三大湾区。在湾区 GDP、GDP 增速、土地面积、人口数量等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指标上，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定优势。

表 2 世界主要湾区经济基础指标对比

指标	纽约湾区	旧金山湾区	东京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
GDP（万亿美元）	1.4	0.8	1.8	1.36
人口数量（万人）	2340	715	3629	6765
人均 GDP（美元）	59829.1	111888.1	49600.4	20103.5
土地面积（万平方公里）	2.1	1.8	1.3	5.6
人均土地面积（平方米）	897.4	2517.5	358.2	827.8



GDP 占全国比重 (%)	8.88	4.04	32.31	11.8
GDP 增速 (%)	3.5	2.7	3.6	7.9

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在港口、机场、道路交通等领域均具备互联互通的优越条件，且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具有丰富经验，能够为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一小时交通圈”提供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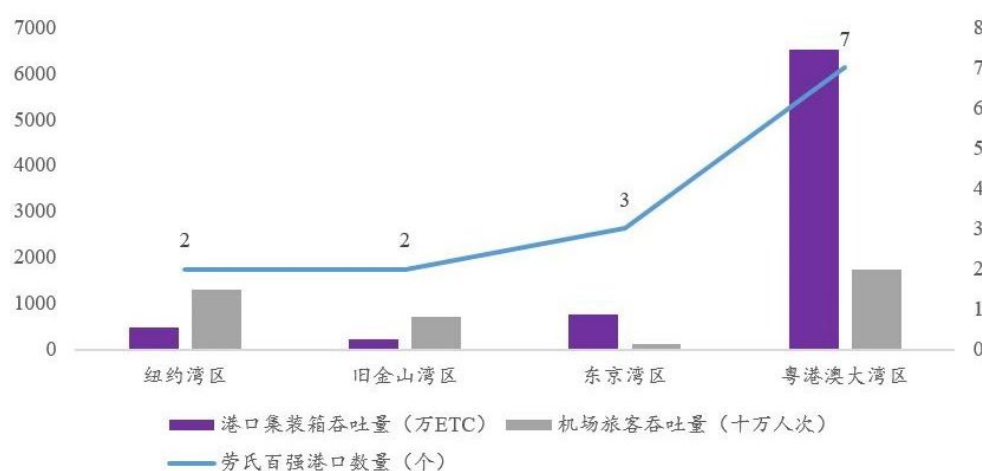


图2 世界主要湾区空港实力对比

其次，粤港澳大湾区将得益于强有力的政府推动力。同世界三大湾区相比，我国政府对大湾区的支持力度是比较大的，这一点同日本比较相似。粤港澳大湾区的政府推动力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国家层面出台了发展规划，使得大湾区建设成为国家战略；二是各部委和湾区各市积极跟进，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政策体系；三是大湾区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人民币国际化等重大工作密不可分，政策之间形成互相呼应和带动的网络体系。

最后，粤港澳大湾区已基本形成“金融+科技”双核驱动力。在金融方面，根据英国智库 Z/Yen2018 年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香港竞争力排名连续三年稳居第三，“纽伦港”全球金融中心第一梯队的地位基本确定，同时深圳和广州该指数排名分别为 12 和 19。在科技方面，广东省的科技创新能力日益增强，深圳已成为我国产业创新中心，战略性新兴产业在 GDP 中所占比重不断提升。根据调研了解，深圳近年来 PCT 专利申请量增长迅速，每年新增的专利数量达到全国的一半以上，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超过 4%，超过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的平均水平。

表 3 世界主要湾区金融与科研条件对比

指标	纽约湾区	旧金山湾区	东京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
金融中心排名	1	14	6	3
500 强企业总部数	17	16	38	17
PCT 专业数量	47794	59762	261308	69347
R&D 投入占 GDP 比重	3.1	6.1	3.7	2.7

2. 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独特的挑战

首先，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个国家、两种体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特点，两岸三地在税收制度、市场监管、资格认证、企业登记等方面都不相同。粤港澳大湾区内还存在严格的边境管理和网络管制。这些问题阻碍了要素的



自由流动，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与其他三个湾区相比面临的最独特挑战。

其次，同全球三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较少，且存在结构错配问题。根据2018年泰晤士教育高等大学排名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共有4所大学进入前100强，低于纽约湾区的10所和旧金山湾区的5所。从地区上来看，4所大学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均在香港地区。从学校专业来看，4所大学的专业均以商科为主，只有香港科技大学兼顾理科人才培养，而内地较好的理工类学校大部分位于北京和上海，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科技中心”的规划存在错配。

最后，同全球三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目标较为多元，体现了对金融、科技、先进制造业、文化等目标的关注，同时还兼顾“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等窗口功能。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兴起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国际背景下，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进入“新常态”的国内背景下，如何通过有限的资源支撑建设综合化湾区的蓝图，也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三、我行在大湾区建设中面临的市场机遇与存在的不足

我行在大湾区的机构布局包括广东分行和深圳分行两个内地一级分行及工银亚洲、工银国际、工银澳门三个境外分支机构。各机构在集团大湾区一体化联动发展平台的指导下，不断完善信息共享、业务联动、产品创新、资源支持，强化境内外一体化联动为客户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

（一）大湾区金融创新前景广阔

通过调研，我们了解到大湾区建设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非常迫切，同时也为金融业务的拓展提供了丰富机会。

1. 重点行业“再出发”催生大量投资机遇

一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领域。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产生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融资需求，重点包括港口、机场、高速公路、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能源、供水、信息通信网络等领域的新增项目和改造升级。尤其是在政府引领的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方面，我行具有优势。**二是科创产业升级领域。**根据规划，“深圳-东莞-珠海”将成为新兴科技和产业创新积聚地，带来新市场、新客户和新机遇，为我行业务系统改进、信贷转型、产品创新提供了契机；**三是宜居城市建设领域。**湾区将执行最严格环保、最高健康标准，医疗养老，并完善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建设宜居城市，在此过程中将产生大量绿色融资需求，绿色建筑、海绵城市、电动汽车等领



域将产生丰富投资机会。

2. “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带来跨境金融服务需求

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将催生更多外向型企业金融服务需求，工银亚洲和工银国际在涉及自贸区建设、保税区建设、资金联动方面具有较强优势，可以促进大湾区企业动能向国际辐射；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不断开放，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途径将日益增多，大湾区作为政策的实验窗口，最容易获得国际投资者青睐，并衍生出大量综合性跨境金融服务需要。

3. 总部经济催生综合金融服务需求

随着“纲要”落地和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粤港澳地区将凭借政策、区域、人才、资金等优势吸引大量企业总部，如深圳市未来三年计划引进8-10家500强以上的总部企业。总部经济发展带动的总部大厦建设、跨区域金融服务、全球现金管理、跨境并购、跨境支付、总部企业高管个人金融服务等综合需求，将成为我行业务发展重要的客户资源和目标市场。

4. 国家和地方支持打开政策“窗口期”

大湾区是国家重大战略，未来中央、地方、各部委都将推出一系列支持政策。通过调研了解，人民银行已完成金融

支持大湾区的政策初稿，报国务院审批，内容可能涉及移动支付、个人账户和理财便利、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自由贸易账户体系、资产跨境交易等十几项重要内容。监管部门将本着审慎稳妥推进的原则，一般会选择部分金融机构进行创新试点，我行将有机会争取试点名额，获得先发优势。

（二）我行服务大湾区建设仍有可提升空间

1. 我行尚未形成对接大湾区战略的顶层制度设计

我行目前确定了以广东分行牵头境内机构，工银亚洲牵头境外机构协同服务大湾区的发展策略，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遇到了一些现实问题。

一是在大湾区的“四核”城市中，我行均设有一级分行，包括广东分行、深圳分行、工银亚洲、工银澳门和工银国际，平级机构间较难实现资源的统一调配；二是地方分支机构较难与政府、国家各部委、金融监管机构有效对接，不利于及时掌握监管动向和把握政策机遇；三是各分行分头制定发展战略，难以形成合力，优化资源配置，也存在一定的重复工作；四是对大湾区发展的相关重要问题尚未开展深入研究。

2. 我行在创新支持大湾区建设方面尚需强化

一方面是在系统建设方面，目前仍无法实现客户境内外信息的统一展示，跨境客户共享效率有待提升；另一方面是



大湾区汇聚了较多的科创企业，带来大量业务机遇，但多数科创企业无法满足目前我行的贷款需求，信贷资金难以进入。

3. 同业优秀实践值得我行借鉴

目前农、中、建、交及大多数地方和城市商业银行均积极布局大湾区。通过调研对标先进做法，我们发现，从部署大湾区时间看，建行与中行启动更早；从支持力度看，中行已确立了由总行牵头的“1+5+N”¹大湾区服务机制，并成立粤港澳一体化联动发展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公司部，设有基建、科创、民生、综合经营（投融资一体化）等5个课题。每季度开联席会，审议湾区机构重点项目进展，明确下一步推动重点；考核上也设有“联动经营指标”考核大湾区联动。中行还在授信、信贷规模上加大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支持；从产品创新看，中行获得了人民银行见证开户唯一一个试点名额，推出“大湾区开户易”服务，见证开立内地个人账户服务，推广首月中银香港共开立2万II类户。

建行提出了大湾区业务拓展的“三个统一、三个共享”原则和十大重点业务领域²；并将资管子公司注册于深圳（“建

1 “1”指中总行，“5”指中银香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中银国际、中银投资和中银集团，“N”是指深圳中行与广东省中行、澳门中行、中银保险、中银证券及中银三星人寿。

2 2019年初，建行总行召开大湾区合作发展座谈会，指出用好政策、大胆创新，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大湾区建设当中，做好构思、标准和部署的“三个统一”以及信息、资源和利益的“三个共享”，明确了下一步关注和支持的十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重大合作项目，中小企业，专业市场，核心企业

信理财”），率先发布了湾区主题指数“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指数”，并在港举办了湾区住房租赁服务发布会。

四、政策建议

（一）对国家层面的建议

1. 开展大湾区金融监管机制的创新试点

制度隔离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面临的最主要障碍，突破制度藩篱，金融业可以先行先试。

一是建议建立粤港澳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主要职责可包括：建立跨境经营风险应对机制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合作机制，进行三地金融监管信息交流、反洗钱及反恐融资合作等；二是建立金融监管信息共享平台，推动大湾区内金融监管信息的对接和数据交换，为金融机构开展客户服务和产品创新创造条件；三是在大湾区内适当放松政策，如放松跨境资金流动、跨境投资、跨境开户限制等。

2. 发展风险投资赋能科创中心建设

科创企业在刚刚开始商业化扩张的阶段最需要资金支持，但因难以达到传统的银行信贷及股权融资门槛，需要发展风险投资的支持。首先可借鉴美国经验，吸收长线资金作为风险投资来源，如养老基金和大学基金等；其次政策支持

产业链及成熟商圈，智能装备制造，汽车、石化、家用电器、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以及制造业绿色改造升级，住房租赁市场，区内大资管业务，广东自贸区建设），提出要借助金融科技的力量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



风险投资在科创企业早期介入，着力培育一批风投机构，营造良好的风险投资市场环境；再次可为外资进入我国风险投资市场提供通道，拓宽科创企业融资来源。

3. 发展金融科技，提升金融服务效率

一是实现底层数据的共享、互联、互通，为金融科技创新打好基础；二是进一步打通监管墙，积极创新金融监管合作方法，如目前港澳监管部门已开始针对金融科技开展“监管沙盒”试验，未来可尝试在控制金融高风险的情况下加强三地之间监管机构的合作，一起进行监管沙盒试验；三是增强金融科技企业实力，根据 H2 Ventures 和毕马威的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科技企业中排名最高的为香港的 We1ab，在全球位列第 36，不仅无法同全球三大湾区相比，也落后于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³。

4. 发展绿色金融，为两岸三地协作提供新路径

一是加强内地与港澳绿色金融官方与民间组织的互动和联络，通过联合研究、产品合作、能力建设拓宽两岸三地协作空间；二是鼓励中资金融机构和企业在香港和澳门发行绿色债券，使港澳居民共享生态文明建设红利；三是为港澳金融机构在内地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提供便利，鼓励其开发跨

³ 中国排名进入前 10 的金融科技公司：蚂蚁金服、众安保险和趣店分别位于杭州、上海和北京。

境绿色金融产品，发行绿色信用卡，对新能源汽车、绿色建筑等项目提供贷款；四是鼓励港澳金融机构在粤参与排放权交易市场，开发相关产品及提供中间服务。

（二）对我行的建议

1. 加强对粤港澳大湾区业务发展的顶层设计

一方面，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重大战略，建议我行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发展战略，规划发展路径，充分考虑粤港澳各地分行的优势和业务特长，形成合力。另一方面，建议加大对湾区分支机构业务发展的资源支持和投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适度放开权限，部分改革发展举措可在大湾区先行先试。

2. 加强与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的沟通协作

一方面，建议我行与监管机构加强“总对总”沟通，以便及时掌握监管动向和把握政策机遇。另一方面，建议我行加强与地方政府的交流、合作。以广州为例，“纲要”将广州定位为综合性门户城市，并确定期货交易所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将落户广州，但广州市政府在如何落实纲要内容方面经验不足，我行应当积极支持。

3. 各业务条线加快推出大湾区专项政策

一是建议优化授信审批流程，降低优质科创企业准入门



槛，积极开展产品创新支持科创企业发展。二是建议加强系统建设，建立响应迅速、稳定可靠、灵活敏捷的科技系统。三是建议加强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分析，建立跨部门、跨条线、总分行联动的研究团队，对重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为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附表 1 我国对粤港澳大湾区的顶层设计

时间	机构	名称	要点
2003 年	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	《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内地与港澳经贸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内地第一个全面实施的自由贸易协议。
2008 年 12 月	国家发改委	《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年）》	到 2020 年，形成粤港澳三地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全球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大都市圈之一
2015 年 3 月	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提出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2015 年 9 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方案》	其中将广东列入省级行政区之中，着眼于深化粤港澳创新合作。
2016 年 3 月	国务院	《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	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促进内地九省区一体化发展，深化与港澳更紧密合作，构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泛珠三角区域，推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向更高层次、更深领域、更广范围发展。
2016 年 3 月		“十三五规划”	支持港澳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跨省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
2017 年 3 月	国务院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	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
2017 年 3 月		《服务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	深入推进粤港澳地区服务贸易自由化，提升广东对区域服务贸易发展的辐射带动力。努力把泛珠三角建设成为引领华南、携手港澳、辐射东南亚、面向全球的服务贸易发展高地和综合服务枢纽。
2017 年 4 月	国家发改委	《2017 年国家级新区体制机制创新工作要点》	要深化粤港澳合作探索，推动建设粤港澳专业服务集聚区、港澳科技成果产业化平台和人才合作示范区，引领区域开放合作模式创新与发展动能转换。
2017 年 10 月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



月	表大会		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
2017 年12 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将粤港澳大湾区列入2018年重点工作，明确提出“科学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2019 年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是指导粤港澳大湾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合作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这份纲领性文件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空间布局等方面作了全面规划，是粤港澳大湾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合作发展的行动指南，

附表2 各地积极出台政策

时间	机构	名称	要点
2005年8月	广东省政府	《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	划分粤港澳跨界合作发展地区。把发展“湾区”（环珠江口地区）列入重大行动计划。
2009年10月	粤港澳三地政府	《大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	提出合力建设充满生机与活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协调可持续的世界级城镇群。提出“一湾三区”集聚、“三轴四层”拓展、“三域多中心”发展的整体空间架构，其中“一湾”指珠江口湾区。
2010年4月7日	广东省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	要率先建设在全国乃至亚洲具有较强引领作用、更具活力、发展潜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新经济区域。
2010年7月	香港、澳门及广东省三方政府	《环珠江口宜居湾区建设重点行动计划》	落实粤港澳大湾区跨界交通合作、跨界地区合作、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和协调机制建设。
2013年8月	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前海加快开发开放的若干意见》	从发展金融业创新、进驻前海港澳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等条件和法律服务合作等方面，推进前海开发开放的步伐。
2014年1月	深圳市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聚焦湾区经济，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新态势。
2016年1月	广东省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	开展珠三角城市升级行动，联手港澳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同年3月广东省的“十三五”规划指出，要发展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粤港澳大湾区经济。
2016年4月	广东省人民政府	实施《粤港合作框架协议》2016年重点工作》	落实《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建设实施方案》中关于粤港合作的项目和措施，加快推动南沙新区片区相关领域对香港的进一步开放。
2016年5月	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	放宽了对粤港澳投资者资质的要求；推进粤港澳服务行业管理标准和规则的相衔接，简化手续；加强与港澳地区的项目对接、投资扩展、信息交流、人才培养等领域的活动。
2017年1月	广东省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	携手港澳推进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2017年 4月	广东省	《广东省现代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以建设粤港澳世界一流湾区为导向,加快建设以珠三角尤其是广州、深圳为辐射中心,以汕头、湛江和韶关为次中心,延伸到市县两级以及乡镇的辐射扩散式服务网络。
2017年 7月	国家发改 委、粤港澳 三地	《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	明确提出粤港澳三地将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城市群。
2019年 6月	澳门特区 政府	《澳门特别行政区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分设14个专栏,涵盖了澳门特区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各领域的重点工作。
2019年 7月	广东省委、 省政府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	按照“三步走”的安排,携手港澳有力有序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2019年 7月	广东省推 进粤港澳 大湾区建 设领导小 组	《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进一步明确广东省今后三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点任务和分工,确保到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下坚实基础